

# 高度警惕有效應對西方國家打壓香港法治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阻擾中國的和平發展，以香港國安法律為藉口，部署了連環打壓香港的措施。誠如有作者指出，西方國家針對香港打出了系列牌：通過發布所謂香港旅遊警告和炮製所謂「香港商業警告」打「恐慌牌」；利用媒體炒作「香港玩完論」「香港內地化論」等打「造謠牌」；通過取消對香港的特殊貿易待遇，鼓譟取消香港特區駐本國經貿辦事處的特權豁免待遇甚至關閉辦事處、叫囂對香港特區官員實施制裁措施等打「制裁牌」。當然，還有通過威脅制裁國安法官、迫使外籍法官辭任特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等打「司法不獨立」的「假象牌」。

顧敏康 香港教育大學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研究中心總監

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情，用「不擇手段」或「窮兇極惡」來形容這些措施是一點也不過分的。未來還可能會出現其他打壓措施。香港是全球最佳營商地點，例如貨幣自由兌換、銀行體系與國際接軌、普通法與司法獨立、資訊自由流通、一流的基礎設施等等。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發揮「八大中心」重要功能，如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國際商貿中心、國際航空樞紐、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為中華民族復興發揮獨特優勢。所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必然會想方設法破壞香港的這些「金字招牌」，阻擾中國的復興。

面對西方國家的連環打壓措施，當然要有效應對，打好法治形象保衛戰，同時也必須揭開其「面紗」，讓世人了解真相。

香港法治水平一直受到世人稱讚，甚至超過美國。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從幾個方面展開打壓行動，說明了香港也必須從這些方面積極應對。

## 西方國家詆毀香港法治經不起推敲

一是西方國家盡一切可能詆毀香港國安法治。但因為是故意抹黑，所以他們的理由是蒼白無力的，經不起推敲。例如，他們指責海外律師不能參與國安案件的事情，因為去年5月10日，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2023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海外律師參與國安案件將以逐案方式處理，並須取得由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法律並沒有排除海外律師參與其他刑事案件，或民商事案件。相反，這些政客恰恰忘了在他們自己國家，海外律師是根本不能參與辦理任何案件的。比如，他們將國安法官與無陪審團制度說成是推翻了普通法裏行之有效的整套制度，完全是缺乏法律知識或乾脆是無知的說法，因為在其他刑事案件中，普通法的整套制度繼續保存與有效。又比如，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在一個論壇上

發表了精彩的講話，西方媒體故意不引用他說的「雙法」始終堅持尊重和保障人權，「雙機制」則是嚴格依據「雙法」運行。西方國家反而攻擊他的「突出法律實效，嚴格依法執法司法，體現法律的尊嚴和實際效果。不能以過程公正替代結果正義，更不能以悲憫之心替代法律尊嚴。」說什麼鄭雁雄主任重結果、輕程序等等。其實，從講話全文看，鄭雁雄主任就是在強調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都需要充分重視，不可偏廢。而西方媒體這種斷章取義的做法，無非是想營造中央政府破壞香港法治的假象。

## 西方國家施壓香港終院海外法官辭職

二是西方國家對香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施壓，迫使其辭職，或通過他們詆毀香港的司法獨立。據報道，兩名英國最高法院前法官岑耀信(Jonathan Sumption)及郝廉思(Lawrence Collins)，以政治理由突然辭任香港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是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第四及第五名辭任的海外法官。西方國家口口聲聲標榜司法獨立，卻不斷製造政治干涉司法獨立的案列，兩位法官的辭職，便是最好的佐證。英國這樣做是希望造成一種假象：香港司法不獨立。其實，這本身也是對英國所宣揚的「三權分立」制度的一種諷刺和干預，也是對香港司法制度的抹黑。迫於壓力，英國最高法院正副院長韋德和賀知義於2022年辭任。兩位法官的辭任帶有很大的政治色彩，韋德之前說希望留任，但英國政府一再提出抵制香港司法機關，法官辭任聲明中也提到與英國政府有磋商的過程。本次法官辭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壓力。當時留任的岑耀信2021年在英國《泰晤士報》撰文，稱香港國安法訂實後有人要求英籍法官辭任，他批評此要求與司法獨立及法治無關，而是等同要求法官參與政治抵制，向中國政府施壓。很可惜，他最終也未能頂住壓力，更發表了一通缺乏事實根據的言論。例如，香港法院上月月底就「35+政權覆案」中不認罪的16人

判決，14人被定罪，他認為：「這個判決在法律上站不住腳，並不一定意味着法治已死。上訴法院可能仍會糾正判決。真正的問題是這個決定是香港司法系統日益萎靡的一個症狀。」這是一個典型的無話找話的事例，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指出：「不同意法庭判決是一回事，但指法庭因政治考慮而削弱基本權利則是另一回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而岑耀信關於「中國人大釋法可以推翻法官的決定」的說法也暴露出他對「一國兩制」缺乏正確的理解。他本來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法官，卻在最後變成了英國政治的犧牲品。外籍法官擔任香港非常任法官是一種具有香港特色的安排，這種制度可以繼續下去。一方面，要遴選真正忠誠於法律、熱愛香港、不為政治所左右的終審法院非常任海外法官；另一方面，香港也要持續推進法官本地化進程。現在在任的非常任海外法官中，有的即將任期屆滿。接下來是否還會有海外法官辭職或任期屆滿後不續任，仍有不確定性，但香港已經具備大量法律人才，不會影響終審法院的正常運作。

## 做好準備應對香港國安法官制裁威脅

三是西方國家威脅制裁香港的國安法官，製造恐怖氣氛。2023年11月2日，美國國會議員提出有關制裁香港官員的法案，要求檢視49名香港官員、法官、檢控官等，將他們列入「制裁名單」，包括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國安委秘書長區志光、警務處處長蕭澤頤、28位前任或現任國安法指定法官，當中有六人為終審法院法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也在其中)。岑耀信曾經說過：如果制裁法官的話，這將會是「粗魯的、適得其反的、不公正的」。一方面，美國意圖利用制裁影響法官公平公正地審訊案件，嚴重妨礙了他們口口聲聲要維護的司法公正；另一方面，香港已經建立了「雙法雙機制」，能夠確保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者得到法律的懲罰。所幸的是特區官員、檢控官、法官，並

沒有被美西方的恐嚇所嚇倒，他們剛正不阿、忠於法律，值得敬重。當然，特區政府和司法機構也要做好充分應對準備，支持和保障他們繼續有效履職。

## 西方國家濫用國安法律無理起訴

四是西方國家以間諜罪名逮捕香港駐英國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日前，包括兩名港人在內的三名在英男子涉嫌違反當地國家安全法被起訴，三人被指監視流亡英國的香港異見領袖，且曾試圖闖入一名港人居所，法庭批准三人保釋出外候審。針對英國濫用國家安全之名行政打壓之實的無恥行徑，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其後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英方，指英方「編造藉口、無理指摘香港特區政府」，又指中方已就此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香港特區政府聲明，指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已就此事發表聲明，並已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英國政府提供聲稱事件的相關資料詳情，正等待回覆。」如果英國一意孤行，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也應當考慮反制措施。

## 西方媒體顛倒黑白應予揭露

五是西方國家通過媒體有系統地部署抹黑香港國際大都市的形象。一些西方媒體經常抹黑香港，並刻意歪曲事實，誤導公眾認知。然而，這是一個網絡時代、資訊時代，人們可以清晰看到這些媒體的偏見與「雙標」立場。美國主流媒體的「雙標」更是在巴以衝突中暴露無遺，例如，《紐約時報》、美國廣播公司、《華爾街日報》等均由猶太人掌控，還有很多媒體雖不直接屬於猶太人，但其廣告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離不開猶太人的支持。因此，這些主流媒體極力迴避對以色列的批評，無視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土地、迫害巴勒斯坦人民的事實。這些媒體，在對待香港問題上也是如此顛倒黑白。儘管人們不會輕易相信他們的報道，但也必須對他們的虛假報道予以迅速揭露與反擊。

# 的士「網約車」並存 促進良性競爭

吳傑莊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社會最近就的士司機服務態度，以及「網約車」能否合法化的問題進行熱烈探討。的士是展現香港「好客精神」的流動窗櫺，但近年的士服務不論市場規模、發展前景和業界聲譽，均出現不少負面消息，「的士病」漸成社會頑瘡，亟待改革創新、整治振興。特區政府應有決斷、有承擔地認真檢視的士的功能定位，完善政策管理，並推動高科技「網約車」，糾正行業陋習，讓的士與「網約車」並存，促進良性競爭，為市民及遊客提供高質的點對點交通服務。

## 的士行業改革刻不容緩

在以鐵路服務為骨幹的公共交通體系中，的士擔承着個人化點對點的接送服務，城市出行的角色吃重，乘客對的士服務的要求亦較高。不過，受限於早年設定的「人車分離」政策，的士牌照屬「永久終身」且不含服務質素規範，加上自1994年起的士牌照停止增發，牌照數量被封頂凍結，供求關係被扭曲，致使的士牌照變成投機炒賣的物品，服務市民的本質反而被忽視，「的士病」被惡化，行業改革刻不容緩。

的士行業改革的本質，是完善行業結構、推動制度創新和實現自我完善，而如何根本性地改革和提升香港的士服務的質與量、引進新競爭，以及如何加深旅客透過乘坐的士體驗「香港無處不旅遊」，則是當中研究的核心。

在制度層面上，特區政府現正推動「車隊為本」的制式管理，有望突破「個體自管」的封閉式結構，糾正「人車分離」積弊，促進業內不同持

份者間的多元競爭。可是在執行上，則應以推動牌照與服務表現相結合，細化和明確化相關的規範條款，以及針對性打擊「黑的」和「殘的」的懲處機制。

香港的士市場持續萎縮疲軟，牌照數目雖被凍結但供求失衡更彰顯，乘客需求、司機收入、車牌價格跌勢未停。立足科技新時代，以創科主導引領的士行業創新營運模式，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在三個方面着手。

第一是研究推動的士服務平台化，成立統一的士網約平台，為乘客和司機提供靈活的價格和配對機制，減少等候時間，協助司機接單，提高服務水平。

第二是特區政府與業界合作整合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互聯網等智能和流動通訊科技，整理和向業界發放有關「網約車」的熱門路線、出行模式、車程時間、耗油量和網約頻率等，將乘客需求和業界運力相對對、提升乘客的生產力和司機收入。

第三，特區政府與業界合作通過大數據分析，糾正司機駕駛態度、優化車輛維修及保養，提升的士服務品質與安全，加速智慧運輸發展。

由於香港正致力建設智慧城市，要確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定位，融合

的士和網約車服務將有利提升香港運輸業的服務水平。在推行規管政策的同時，特區政府也應加強協助的士業界採用與「網約車」服務類近的科技，增強市場競爭力。例如可要求的士車隊加裝電子支付設備，方便市民和遊客，又或仿效「網約車」，利用網絡科技在短時間內為需要接載服務的消費者配對司機，為乘客提供便利等等。

## 為乘客打造個性化出行選擇

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是激活市場活力的關鍵。通過適度競爭和差異化經營，可讓傳統的士與「網約車」共生發展，並且倒逼的士業界提升服務水平，打造香港的士品牌，並為乘客提供更多元化、個性化的出行選擇。

「網約車」平台是網絡經濟乃至智慧城市的一部分，的士與「網約車」更非「你死我活」的關係，彼此各有優勢和市場，絕對可以達至業務平衡共存、服務多元互補，關鍵點是有否出台「網約車」合法化並納入規管的框架機制、能否保障乃至提升「網約車」乘客的利益、能否整體提升的士服務質素，特區政府和業界均應予深化研究。



◆的士服務良莠不齊，不少市民開始轉投「網約車」平台的懷抱。  
資料圖片

# 改善社區建設 令香港更宜居宜業宜遊

龍雁儀 海南省政協委員



國家「十四五」規劃確立香港「八大中心」定位，無論是金融、創新科技、貿易、航空還是文化藝術，均顯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地位，以及在國家發展中的定位。對接國家戰略，香港須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積極引進高端多元的人才推動發展。在祖國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憑着優質基礎設施，對內對外擁有便捷的交通網絡、簡單的稅收制度，以及良好的治安，成為不少人心中的安樂窩。經濟上，香港以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加上「背靠祖國」的獨特優勢，以及現時大灣區的發展勢頭，成功吸引資金投資落戶。

然而，近年香港被評競爭優勢大不如前，本地人力資源不足，令各行各業勞動力量捉襟見肘，影響服務質素。從社區建設的角度思考如何增強香港的宜居度，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既讓本地市民安居樂業，同時又有效吸引外來人才，從而增強城市競爭力，實在是關鍵的課題。

社區是一個城市的單元，如何打造香港成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社區，增強地區基礎設施，絕對值得探討。香港人口密度高，造就了獨特的城市形態。市區密集的人口，能支持一定的經濟規模，每個社區都有購物中心或大量食肆商店，以及其他社區配套如醫療服務、文化康樂等社區設施。香港公共交通網絡完善，且價格相宜，出行方便，有助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香港城市景觀有一特別之處，便是有大量空中行人走廊，以解決地面空間不足的問題。這些行人走廊接駁不同大廈，往往以鐵路站為重要連接點，能將公共交通網絡與當區不同建

築連接起來。有些行人天橋由政府、私人機構，或公私營合作模式興建，能增進社區人流，有效擴展社區不同角落的經濟。這些行人天橋系統能將人車分開，減少交通擁堵，提高城市的運輸效率。一些行人天橋更設計美觀，還可作為城市的拍照熱點，提升城市形象。

很多內地朋友來到香港，對建築物能以行人走廊連接起來，都嘖嘖稱奇，認為這些景觀少有機會在內地可見。其實，以天橋連接不同建築物，不論對建築物業主還是路過的市民，都是雙贏局面。隨着香港持續進行城市更新，樓宇重建更有利與行人走廊系統設計，增強社區的可行性。特區政府可從政策及行政角度出發，鼓勵增加建設這些社區設施，惠澤市民。

另一方面，綠化空間亦是社區中的一個重要配套設施。綠化空間能提升生活品質，提供市民休閒及交流的場地，並能美化城市景觀，改善地區的微氣候。優質的綠化空間設計，能以人為本，吸引市民流連享用。香港也要以自然為本，考慮到生物多樣性，提升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抵抗力，從選取植物種類，以及更宏觀地考慮如何與周邊綠化地連繫形成綠色走廊，讓動物如雀鳥及蝴蝶在市區內的綠色環境穿梭，增強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表現。

香港缺乏充足的土地，要加強社區建設、增加綠化空間確實不容易。長遠而言，要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增強地區基礎設施，增加綠化空間，需要進一步優化城市規劃，並將綠化空間納入重要的考慮因素，鼓勵更多綠化空間設計之餘，更要優化設計上的質素，如生物多樣化等，才能提升幸福感，令城市更宜居宜業。